

石家集的红色基因

高峰



图为安庆市德宽街上的石德宽烈士雕像

与数倍于己的敌军短兵相接，身受重创，仍全力奋战，不幸身中数弹身亡，年仅26岁。

石德宽烈士遗骨长眠黄花岗，英名列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碑记。

四

石寅生(1878年——1944年)，名德纯，字仰文，号厚斋，又号寅生，他比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石德宽大七岁，是石德宽的族兄，他住的石家塘面村与石德宽烈士故居石家老邸相邻。

石寅生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1907年春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10年夏返国入京，任刑部金事。民国元年，孙毓筠任安徽都督，石寅生任都督府秘书长。

石寅生的传奇人生在于他47岁开始弃文从戎，花甲之年领军抗日。

从一个光杆司令起家，一跃而成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六军的中将将军。在北伐期间，蒋介石难容旁系，1928年初将这支部队“编遣”了事，给了石寅生一个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的名义，加以羁縻。

抗战爆发后，年近60岁的石寅生以民族大义为重，走出闲居十年的家门，招集旧部，在家乡寿县组建了皖北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一路军，任总指挥，领兵抗日。

石寅生将兵力布置在沿淮铁路两侧，一边作战一边破坏日军的水陆交通运输，对敌威胁甚大。1938年夏，攻克被日军沦陷的寿县城，立下了大功。

主政安徽省的新桂系当局深感不安，以“赤化嫌疑”宣布解散人民自卫军。此后，军中的共产党员郑抱真、曹云露、赵策等都带领所部，归入了新四军的战斗序列。

1939年石寅生被选为省参议员，后在二届参议会上，又被选为省参议会议长。议长江玮年老多病，所有会务由石主持。6月1日先生带病主持省二届二次参议会，不料次日喘病突发，3日晨送回天堂湾郑祠寓所，抢救无效，于下午1时溘然长逝，终年66岁。

五

石德宴，字会宾，石家集石家老邸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冬至1925年6月，石德宴在石家集小学一边以教书为掩护，一边从事革命活动。

1923年冬，安徽第一个党组织小甸集特支成立了。随后，薛卓汉、方运帜、陈允常到瓦埠小学教书，他们在这支部队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瓦埠小学党支部，直属中共中央领导。

这是继小甸集特支后，寿县第二个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的早期党组织。

瓦埠小学党支部有三任支部书记，第一任和第二任书记分别是方运帜(任期1924年9月—1924年10月)和方运初(任期1924年10月—1924年冬)，石家集人石德宴是瓦埠小学党支部第三任支部书记(1924年

冬—1925年6月)，在他担任中共瓦埠小学支部书记后，将支部驻地 and 活动中心由瓦埠小学移至“瓦西”的石家集小学。

石家集因此成为“瓦西”革命火种最早点燃的地方。1925年6月至1926年冬，中共城关支部成立，直属中共中央领导。瓦埠小学支部活动停止，所辖所有中共小组划归城关支部。这个时候，新成立了中共石家集党小组，它是城关支部所辖十个小支部之一，中共石家集党小组驻地石家集小学。

1927年10月25日成立中共寿县临委，在县临委的主要负责人中，石家集人石德伦(1927年11月—1928年3月)负责农运。寿县临委先后恢复或建立了12个支部，4个特组和1个特支，包括1927年冬建立的中共石集特组。

1928年3月7日，召开寿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改选县委，正式成立中共寿县委员会。石家集人石玉鼎当选为县委委员(1928年3月—1928年7月)。此间，中共石集特组书记为石德宴，驻地石家集小学。1928年9月中共石集特组更名为中共石集支部，属中共保义区委。

六

石家集小学是共青团寿县支部和共青团寿县地方执行委员会驻地。

寿县建党是从建团开始的，最早的团组织是1922年春曹蕴真在小甸集成立的。小甸集SY(英语“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编写)特支，直属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1924年夏，薛卓汉、徐梦秋回到家乡，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寿县支部。支部共有两任负责人，先是徐德据，后是石德宴，有团员11人。1925年1月，改称共青团寿县支部。

1925年12月12日，共青团寿县支部负责人石德晏给团中央写信，汇报寿县团组织寒假期间的主要工作，成立“寒假新剧团”。1925年冬，石德宴根据团中央指示，在共青团寿县支部驻地石集小学创办了“寒假新剧团”。联合各小学教员和学生，深入农村巡回宣传，所得募捐全部资助贫困学生；同时散发《犁头周刊》《中国农民》几十份。

1926年3月，薛卓汉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寿县成立共青团寿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得到石德宴、石裕鼎的大力支持。3月7日，薛卓清、方耀霞、曹练百、石补、石子安、洪养素、石德晏、石裕鼎、薛卓汉9人在寿县窑口集开会，成立了共青团寿县地方执行委员会，直属团中央领导。地方书记薛卓汉因事赴省，事务暂交候补石裕鼎代理，通讯处“安徽寿县石家集私立小学”。

从1925年12月12日到1926年6月9日，共青团寿县支部和寿县地方团地委分别以石德宴、薛卓汉、石裕鼎、裴年志(石裕鼎代号)分别向团中央写信汇报工作20次，其中，1926年4月就写了6封信，分别是4月3日、4月6日、4月14日、4月18日、4月21日、4月24日。这些信件原手稿均藏于国家档案馆，石克方老人保存有书信的复印件。

中国共产党寿县地方执行委员会代理书记石裕鼎，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石德宽之子。团县委委员薛卓清、方耀光、曹练百、石补、石子安、洪养素、石德宴、石裕鼎(代理书记)、薛卓汉九人。其中石补、石子安、石德宴、石裕鼎四人均当时的石家集小学教师。石补、石德宴为亲兄弟。由此可见，石家集尤其是石家集小学是寿县早期团组织的重要活动中心。

七

2023年7月1日是建党102周年，小甸集特支成立100周年纪念日，时隔将近100年后，在安丰镇(石家集)当年寿县党团组织秘密活动的中心，一个新的“寒假新剧团”又诞生了。他们传承红色文化，赓续红色血脉，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演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他们出现在纪念日、节假日，出现在石集街道、梧桐村广场、甲贝村舞台、青峰村敬老院……

红色，是一种信仰，是中国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染成颜色，无数革命先辈用生命去检验、践行的，并且在一代代地不懈努力中，成为我们世代传承的红色基因和根脉。

淮南养育的北魏“好人”赵琰

周 强



北魏是南北朝时期统治中国北方的鲜卑族政权，初期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孝文帝实行汉化改革后迁都洛阳。《魏书》是一部记载北魏历史的断代体史书。二十四史中，大都将社会中行孝道，重养亲的孝行者集合在一个篇目中进行记述，篇名或为《孝友传》，或为《孝义传》，或为《孝行传》，唯《魏书》作《孝感传》。《魏书·孝感传》所记都是当时的中国北方“好人”，其中第一位即是淮南养育的赵琰。

赵琰，字叔起，秦州天水郡人。秦晋淝水之战后，前秦很快土崩瓦解，关陇地区陷入无休止的战乱。赵家乳母为淮南人，因为战争被掳掠西北。淝水战胜后，为南方赢得数十年的和平时期，于是赵琰“为乳母携奔寿春”。寿春风朴朴实，民俗纯正，历史早有流传。不晚于北宋的《寿州图经》记载，当地“其俗尚武，稍习文辞，务俭勤农，知慕孝行”。这个评价是对千年来寿县乡风民俗好传统的高度概括。其后北宋《太平寰宇记》亦称，寿春“山川风气刚劲，故习俗尚朴，民力耕桑，性率直真，人尚节义”。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少年时代的赵琰形成了“塞天地而横四海者，唯孝而已”的思想认识。

14岁时，赵琰的世界观已经基本形成，这时他从寿春回到天水故乡。此后赵琰对父母向来是精心奉养，茶水饭食，必定亲自调弄。出仕后也笃行孝义，将父母一直带在身边，精心侍奉。

赵琰出任后，官阶并不高，最初任兖州司马，相当于省军区参谋。后来转任团城(今山东沂水县)副将，相当于军分区副司令员。北魏献文帝皇兴年间(467—471年)，赵琰调至京师平城，担任淮南王府长史，相当于王府总管家。说来也是巧合，寿春是汉魏晋朝朝的淮南国王都，赵琰是从南方的淮南国王都走出，最终又进入北方的淮南王府。

赵琰进入王府之后，不仅自己以身作则，而且对王府属员要求也很严格，决不允许他们仗恃特权，发生任何欺压

百姓的行为。京城一度缺粮，王府奴婢准备将碾粟筛出的瘪谷拿到市场去卖高价，赵琰看见后，将她们狠狠地训斥一顿，责令留下瘪谷供自己食用。赵琰派人到王府购买粗刀，回来验收时发现多了6把，他立即让人送还主人。货主从来没见过像这样公平买卖的王府官员，非常感动，坚决不收退回的货物，赵琰命人将粗刀放下就走。

赵琰曾送儿子赵应到冀州订亲，随从在路上偶然拾到一只羊，走了30里后，赵琰发现多出的羊，问清缘由后，赵琰很生气，责令仆役立即将羊送还原处，交给失主。一行人在路边酒店用膳，店家的菜里有羊肉汤，赵琰无意中听说食材是顺手牵来的“无主”之羊，于是始终不愿就餐，以示“抗议”。

鲜卑族最初是游牧民族，风俗禁制很严，规定大臣以及大臣的亲属死后都不能归葬故乡。赵琰的父母在平城去世，之后的30多年中，每到祭祀拜奠的时候，赵琰总是为不能归葬双亲之事而感忧愁，因此逢年过节总不接受子孙祝贺。随着赵琰年纪渐高，他的孝顺之情也愈重，感叹岁月推移而迁坟无期，于是不吃盐粟，断除众味，只吃麦食，80多岁时在平城去世。北魏迁都洛阳后，其子赵应才有机会将祖父母和赵琰的骸骨迁还故乡天水安葬。

赵琰辅佐的淮南王拓跋他是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的孙子，“身长八尺，美姿貌，性谨厚，武艺过人”。拓跋他一生中战功显赫，威震南北，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淮南王。赵琰作为王府长史，实际上相当于拓跋他的“秘书长”。《孝感传》中虽未记载赵琰为淮南王出谋划策的具体大事，但从他的点滴细微小事中可以窥见其大政人品。“性谨厚”的拓跋他得到孝心孝行俱佳的赵琰辅佐，正是相得益彰。拓跋他在历史上留下比较好的名声，与赵琰这位好的王府“秘书长”尽心辅佐有很大关系。赵琰在淮南王府发挥的完全是正能量作用，因此在史籍中留下的也是美名，作为普通官员能够进入《孝感传》，说明赵琰的所作所为在当时很有影响。

赵琰的世界观是在淮南形成的，淮南地区的风土人情融进了赵琰的道德涵养，因此淮南应该记住自己曾养育过的北魏“好人”赵琰。

研究淮南的“楚文化” 须扩展时空、提炼精神

许从长



淮南日报社 淮南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联办

楚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随着近年来越来越深入的研究，楚文化的历史地位越来越受到重视。淮南市把楚文化定位为城市文化符号，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我斗胆说一句，目前的诸多楚文化特征较明显的城市中，深入挖掘出属于自身城市内核特征的其实不多。我以为，淮南在这方面有文章可做。

楚国从兴起到全盛再到灭国，随着势力范围的变迁，其影响涉及到包括今江苏、安徽、河南以南的小半个中国。由此也带来了楚文化呈现出的不同的特征，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有过西楚、东楚、南楚的“三楚”的论述。西楚是发源地和兴盛地，南楚是影响已及但尚未开发之地，而东楚则是其主动出击的拓展地和最后拒绝灭亡的抗争地。被司马迁放在“南楚”的寿春则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既是西楚东移的重心区域，也是东楚、南楚和中原地区的枢纽，所接受的影响和自己的沉淀，构成了淮南楚文化的独特的特征。所以，研究淮南的“楚文化”，我觉得必须扩大空间，拉长时段，提炼精神。

淮南在楚国势力到来之前，是淮夷的地盘，境内有州来、舒蓼等方国。淮夷人擅长农业、治水，州来就是以种植麦为生计，舒蓼也是以种植药草著称，这也是楚扩张至此后在这儿经营的基础，由此也在融合后诞生了闻名世界的芍陂工程。而颍水、汝水和三条淝水的沟通中原和东南吴、越的交通优势，事实上成了沟通江、淮、河、济这“四渎”的枢纽。尤其是战国时期，随着楚国在以淮南为中心的东楚的重点经营，淮南成了一个受楚文化影响明显、又同西楚的“内嵌”性有明显区别的“外向”特征——重农亦重商，重实际也重眼界。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乍一看很奇怪的现象：西楚的士以屈原为代表，一心守着楚

国，少有中原地区的“异国出仕”；东楚的士，则既有“客仕”秦国、为秦的强大、统一立下汗马功劳的李斯、甘氏父子，也有坚决同秦抗争的春申君、项燕、范增等人。

但仔细分析，这一点也不奇怪。坚定了信仰的东楚人(包括被司马迁分在“南楚”的淮南人)，都在为自己的信仰努力奋斗者，矢志不渝!这其中，发生在淮南的持续数十年的反抗暴秦的斗争可歌可泣!郢都陷落后的惨烈和屈原自沉汨罗的人格激发，让以寿春为中心的楚国君臣，像考烈王和春申君黄歇、昌平君和项燕等，前赴后继，英勇壮烈，铸就了楚人反抗的血性，且让“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抗暴誓言在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陈胜、吴广起义，打出的是“张楚”(意即“张大楚国”)旗号；项梁、项羽叔侄继起，建立的是“西楚”；据说是屈原堂弟屈斗弟子、在寿春被攻破后隐居家乡石集练兵的范增，听到项梁起兵，不顾年过七十，千里迢迢去投奔，为楚复仇……

有眼界、有血性之外，农、商并重，也造就了淮南为中心的东楚人重义、重廉、轻利的特点。在国家遭受强秦逼迫的危急时刻，春申君把自己经营成熟的寿春城和封邑淮北十二县，毫不犹豫的奉献了出来。个人私利让位大义，让“廉洁”在这块土地深深扎根，影响后代，无论是“土著”还是“过客”。春申君之前，有清风惠政却“枵腹菜羹”，持廉至死，留下“优孟衣冠”典故的楚令尹孙叔敖；春申君之后，有上任时乘牛车来，离任时留牛犊去，不肯带走“一片云彩”，留下了“时苗留犊”美谈的东汉人时苗；有把廉洁自律、克己奉公当作家风传承，父子二人皆以清廉著称于世的魏晋时的胡质、胡威父子；有身为大将，却俭朴到吴主孙权聚至其家时，见其“母疏帐被破，妻布裙”，因而感叹不已的蒋钦……

所以，对淮南的“楚文化”的研究，要抓住它真正“独有”的特性，全面、深刻，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如此才能让“楚文化”成为也曾做过“郢都”的淮南的一面金字招牌，才能在淮南旅游文化中形成自己独特的魅力。

“鹊巢知风”与高瞻远瞩 ——《淮南子》成语典故中的哲学思考

张纯林



知风向而选择合适的位置，水獭建穴是根据水位的高低来决定的，雄鸬鸣唱预报天将要放晴，雌鸬鸣唱预报天将要下雨，这只不过是动物与生俱来的一种本能反应罢了。因此就说人的智慧还不如鸟兽，这种看法就不对了。为什么呢?

《淮南子》在第十八讲《淮南子·人间训》里是这样解说和论述的：“夫鸬先学识岁之多风也，去高木而巢扶枝，大人过之则探股，婴儿过之则挑其卵，知备远难而忘近患”。这段话的大意是，乌鸦、喜鹊知道一年中哪个季节风暴最多，于是就将原本建在高大树梢上的鸟巢迁到低矮的树枝上安窝以避风险。但这样一来，大人路过时就可随手抓到巢窝里的鸟蛋玩耍。所以，乌鸦和喜鹊只知道预防遥远的灾难，却不知道这样一来，又造成眼前的祸患。由此可见，动物有自身本能的“能动性”，可没有“主观能动性”。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有思想、有高瞻远瞩的预见性、有“主观能动性”。

因此，“鹊巢知风”就揭示出这样一个哲学的基本问题：即“能动性”和“主观能动性”。对动物来说，不存在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虽然动物也有“能动性”，但是不能称之为“主观能动性”。动物的活动和“能动性”与它的生命活动是同一的，不具主观性。“鹊巢知风”，似乎也表现出某种“目的性”、“计划性”，能提前采取趋利避害的行动，可这只是动物在长期适者生存的自然环境中形成的一种本能，它和人的有目的的自觉

活动有天壤之别。“主观能动性”为人类所特有，一切动物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打下它意志的烙印。

“主观能动性”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人这个社会主体能主动地认识客观世界；二是在认识的指导下人能主动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二者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就构成人类区别于自然界其它动物的“主观能动性”。因而，只有人类对周围世界有着积极的、高瞻远瞩的预见性和“主观能动性”，并通过实践的过程，利用自然及社会规律，去为实现自己的计划方案和战略目标服务。

为了进一步论述人有思想、有高瞻远瞩的预见性、有“主观能动性”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淮南子》在第十讲《淮南子·繆称训》中是这样以典论理的：殷商末期，商纣王的叔父箕子佐政时，见纣王每每进餐非用象牙筷子不可，就哀叹不已。预感到纣王用象牙筷子必然还会有玉杯相配的奢求，君王这样奢侈贪欲下去，开不良风气，将会导致国家灭亡；鲁国不能杜绝殉葬恶习，改用木偶人殉葬，令主丧“重孝亲，轻丧葬”的孔子对这种不仁德的殉葬之风心痛叹息，诅咒那些不仁的推行者将断子绝孙。以上两种预见最后果然成真。所以，圣贤之人看到事物的征兆，就能预知到事物的结局。有了预见性，发挥“主观能动性”，见微知著，正确处理“远虑”与“近忧”的关系，才能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防患于未然。

“鹊巢知风”与高瞻远瞩 ——《淮南子》成语典故中的哲学思考

《淮南子》是一部把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到极致的政治哲学。它在纵论治国理政之道时，告诫汉王朝的当政者：不要局限于“鹊巢知风”的一般本能，要有高瞻远瞩的远见卓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要有“顶层设计”，又要有“底线思维”；远虑近忧，见微知著，既懂得察灾福与祸的转化关系，又要考察利与害的正反演变；既研究得与失的脉络踪迹，又要揭示事物从始到终的内在关系；既分清各种事物的微小区别，又要陈述存亡之机变，才能使大汉立国七十年来形成的“文景之治”盛世昌隆。

但《淮南子》讲这种“经世致用”的政治哲学时，不是用高度抽象的思辨玄学来刻板说教，而是承先秦“诸子百家”论政之遗风，运用大量的历史典故、寓言故事和民间传说去论述人世间的各种相互关系，寓“理”于用“典”之中，寓“道”于论“理”之上，层层递进，循循诱导，充满先秦以来，古代朴素唯物辩证法哲学的中国特色。

《淮南子》在第十讲《淮南子·繆称训》中说：“鹊巢知风之所起，獭穴知水之高下，眸子知昼，阴谐知雨，为是谓人智不高于鸟兽，则不然。”这意思是说，鸟鹊筑巢